

## 论西夏的石刻档案

□赵彦龙, 乔娟

摘要: 西夏档案虽然在蒙古军队的铁蹄下几乎毁坏殆尽, 但从近年考古出土的西夏文献以及相关的史籍记载来看, 西夏的档案种类几如中原王朝一样齐全, 特别是考古出土的西夏石刻档案, 成为保留西夏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最为原始和真实的记录, 十分珍贵。为此, 本文首先对考古出土的西夏石刻档案及史籍记载的相关西夏石刻档案作一细致的钩沉和梳理, 其次对西夏石刻档案的种类、价值等进行比较深入的论述, 从而实现对西夏石刻档案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

关键词: 西夏; 石刻; 档案

作者简介: 赵彦龙 (1966—), 男, 宁夏西吉人,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书档案研究; 乔娟 (1986—), 女, 山西吕梁市人,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2010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古典文献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12 年西部项目“西夏档案及档案工作”(项目批号: 12XTQ013) 阶段性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西夏公文写作研究”(项目编号: 09YJA870017) 阶段性成果。

西夏是公元 11 世纪至 13 世纪初, 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地方性的民族割据政权, 历 10 主, 约 190 年。党项及西夏存续期间, 在不断地学习、借鉴、模仿中原王朝文化的基础上, 创造出了十分丰富的西夏文化, 西夏档案便是其中之一, 虽然说西夏档案在蒙古军队铁蹄下损毁殆尽, 但实际上随着近年来西夏档案的不断出土, 尤其是西夏石刻档案的出土, 真实而全面地展示出西夏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文化等状况。在汉文史籍记载西夏档案十

分贫乏的状况下, 出土的西夏石刻档案就显得更为珍贵和重要, 它不仅成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弥补了研究西夏历史文化过程中的很多缺失, 更成为中国古代档案的有机组成部分, 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为此, 我们有必要对西夏石刻档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 一、西夏石刻档案整理概述

#### (一) 西夏石刻档案的内涵

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

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sup>[1]</sup>。

石刻是指刻有文字、图画等的石制品和石壁。石刻上的文字或图画大部分都具有原始记录性，能够准确地反映当时、当地人们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是一种重要的古代档案，因此，在档案学界被称为“石刻档案”。

西夏石刻档案主要是指党项割据政权时期的党项人、西夏建国后的西夏各民族人民以及西夏灭亡后的西夏后裔刻写或描画在各种石材上的文字资料或图画，这些文字资料或图画能够真实反映党项及西夏人民的生活原貌，是党项先祖及西夏人民为中华民族保留下来的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

## （二）西夏石刻档案的种类

西夏石刻档案的分类标准不同，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种类。我们这里主要从西夏石刻档案的存在形式来进行区分，将其分为墓志铭、经幢、碑刻、造像题记、摩崖等五种。

### 1. 墓志铭

墓志铭即埋于墓中刻有墓主身份状况和事迹的石刻。这类石刻档案主要收录在《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具体名录如下。

（1）S32·001 唐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墓志铭并盖。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八月立石，陕西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2）S42·001 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唐乾宁二年（895年）立石，陕西靖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3）S52·001 后唐永定破丑夫人墓志铭并盖。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十月立石，陕西榆林市榆阳区城墙文管所藏。

（4）M42·001 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二月立

石，内蒙古乌审旗文管所藏。

（5）S32·002 后晋定难军摄节度判官毛汉墓志铭并盖。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九月立石，陕西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6）S42·002 后晋国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并盖。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四月立石，陕西靖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7）S32·003 后晋定难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并盖。后晋天福八年（943年）七月立石，陕西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8）S52·002 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并盖。后晋开运三年（946年）二月五日立石，陕西榆林市榆阳区城墙文管所藏。

（9）M42·002 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后汉乾祐三年（950年）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0）M42·003 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后周广顺二年（952年）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1）M42·004 后周绥州太保夫人祁氏神道志铭。后周显德二年（955年）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2）S32·004 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成墓志铭并盖。北宋乾德四年（966年）闰八月立石，陕西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13）S32·005 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并盖。北宋开宝二年（969年）十一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14）M42·005 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并盖。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八月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5）M42·006 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

后李继筠墓志铭并盖。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八月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6) M42·007 宋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并盖。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一月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7) HN12·001 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立,河南濮阳县东柳屯镇杨什八郎村杨氏家族集资修建的碑亭内。

(18) G52·001 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立,甘肃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

(19) HN22·001 明故忠义官李公墓志铭。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博物馆藏。<sup>[2]</sup>

## 2. 经幢

经幢是一种宗教石刻,兴起于唐代。“经幢是在唐代初兴起的一种宗教石刻,以其形似佛教用品幢而得名。幢是梵文‘驮缚若(Dhvaja)’的译名。原本是一种由丝帛制成的伞盖形状的装饰品,顶端装有如意宝珠,下边有长木杆,树立在佛像面前。”<sup>[3]</sup>经幢一般可分为座、身、顶三个部分。各部分往往为单独的石构件,待雕好后合建成一体。主体为一根八面的石柱,幢座大多为覆莲形,下有须弥座,幢顶一般雕成仿木结构建筑顶部的攒尖顶,顶端托宝珠,幢身上雕刻经文或佛像,有些较大的经幢幢身分为若干段,称为若干级,各段之间用宝盖形石雕相隔,宝盖上刻出模仿丝织物的垂幔、飘带、花绳等。

西夏经幢主要有以下两种。

(1) N42·002 西夏陵石经幢。宁夏银川市西夏博物馆藏。<sup>[4]</sup>

(2) HB12·002 保定西夏文石经幢。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刻石,河北保定市莲池公园藏。<sup>[5]</sup>

## 3. 碑刻

碑是作为纪念或标记而镌刻文字并有固定形制的地面立石。据文献考证记载,早在西周宫庙之中就已竖立石碑,观测日影以判断时间。到东汉时,碑刻大量兴起,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峰,其形制也渐渐地固定下来。一座完整的碑大致由碑首、碑身、碑座三个部分组成。

碑刻从其记载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一是记事碑,记述某一具体事情;二是人物碑,追述某人生前德行;三是功德碑,记述某人丰功伟绩;四是记言碑,记述圣人言论;五是宗教碑,记载宗教重要活动或事项。

西夏碑刻保留下来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 S62·001 吴旗金夏划界碑。金正隆四年(1159年)立,陕西吴旗县文管所藏。

(2) G42·001 黑水建桥敕碑。西夏乾祐七年(1176年)立,甘肃张掖市博物馆藏。

(3) G12·001 敦煌莫高窟六体文字真言碑。元至正八年(1348年)立,敦煌莫高窟藏。

(4) HB12·001 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元至正十年(1350年)立,河北保定市莲池公园藏。

(5) G62·001 甘肃永靖炳灵寺西夏文题刻。

(6) B62·001 居庸关云台六体文字石刻。元至正五年(1345年)刻。

(7) G72·001 甘肃永昌圣容寺六体文字石刻。

(8) G32·001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立石,甘肃武威市博物馆藏。<sup>[6]</sup>

此外,汉文西夏文献中还记载有两通碑刻,一是“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西夏天庆三年(1038年)立石,碑佚,文存;二是“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瘞佛顶骨舍利轨”,

西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立石，碑佚，文存<sup>[7]</sup>。

#### 4. 造像题记

造像题记是刻写在石窟或石穹室壁上用于补充说明相关事项的档案材料，“宗教造像题记是宗教石刻造像的纪念说明性石刻文字，又称造像碑。这种石刻档案出现于南北朝时代”<sup>[8]</sup>。其发展源远流长，各朝各代都有一定的造像题记保存下来。古人开凿石窟或者在窟内凿刻佛像，往往都要刊刻题记，将造像人的愿心附记于上。西夏的造像题记数量也较庞大，现抄名录于下。

（1）莫高窟、榆林窟西夏题记，共有夏文、汉文墨书、题刻100多处。<sup>[9]</sup>

（2）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西夏文题记，3处。

（3）拜寺口西塔穹室壁面题字，3处，分别为梵文、西夏文和汉文。<sup>[10]</sup>

#### 5. 摩崖

摩崖就是在天然形成的、比较平整的悬崖上刻文记事的一种石刻档案。这种石刻档案在西夏并不是很多。学界对摩崖也作过研究，认为“所谓摩崖是指利用天然的石壁以刻文纪事的石刻，所以，有人称之为‘天然之石’，为刻石的一种”<sup>[11]</sup>。“摩崖一般选择一片较平直的石壁，在上面直接刻铭。汉代有些摩崖也在石壁上加以整修，凿出一块规整的平面后，再在上面铭刻。甚至有些摩崖是在石壁上凿成一个碑的外形平面后刻写上铭文。”<sup>[12]</sup>

西夏摩崖主要有以下几种。

（1）N52·001 贺兰山岩画西夏文题刻。

（2）N62·001 大麦地岩画西夏文题刻。

（3）M62·001 阴山岩画西夏文题刻。<sup>[13]</sup>

此外，西夏摩崖还有西夏王陵三号陵、五号陵、六号陵、七号陵、八号陵、西夏

陵区采集残碑，以及M177陪葬墓出土残碑、M182碑亭出土残碑、M161西碑亭出土汉文残碑<sup>[14]</sup>，还有闽宁村西夏二号、三号、四号、七号墓残碑<sup>[15]</sup>等共计约5000块。

## 二、西夏石刻档案的价值

20世纪在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献资料，其中不乏数量可观的西夏石刻档案。这些石刻档案虽说大部分残损严重，但从目前公布的情况来看，种类繁多，内容尤为真实，是研究西夏最为重要而且最为原始的资料，它不仅能补充和纠正文献中的诸多缺略和谬误，而且也能研究西夏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地理、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城镇建设、民族关系、民风民俗以及语言文字等提供丰富可靠的资料。

（一）西夏石刻档案反映了西夏较高的雕饰艺术水平

西夏有很多石刻档案的载体上刻有十分丰富的花纹或图案，这些花纹或图案被拓下来之后就成为石刻档案的花纹或图案，体现出了比较高的雕饰艺术水平。以西夏故地出土的仁宗仁孝寿陵（七号陵）西碑亭西夏文碑（阳面）为例来说明西夏的雕饰艺术价值。“碑首边刻二龙戏珠，正中额头为篆书西夏文铭文，铭文以卷草花边框之。碑身为扁平抹角长方体，左右侧边饰卷草纹。碑阳四周边饰水草游龙宽带纹。上下两边可能各有四条龙，朝着顺时针方向，似旋转飞腾，相互追逐。这些缠绵的蔓草，游动的飞龙，线条如流水行云，清晰流畅。”<sup>[16]</sup>石刻档案显得庄重美观，清新灵动。再如编号G32·001“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这一碑刻的四周“线刻花草纹，碑头文字两侧各有一身线刻一有头光的伎乐天，作舞蹈状。乐伎画刻细腻，眉间饰有圆形宝珠，体扭腰呈‘S’型，一足

蹲姿立地，另一足离地上翘，两脚作腾踏状，双手持帛带作旋转状，帛带随风飘起似在转动，有西域或印度舞姿势。碑刻的饰纹受西域佛教文化影响”<sup>[17]</sup>。编号G42·001“黑河建桥敕碑”的“碑额线刻两身托盘曲腿伎乐天，身穿交领大袖长衫，无飘带，拱手作供养状，四周刻云气纹，碑额和碑铭四周刻缠枝花卉和云纹”<sup>[18]</sup>。像这样的石刻档案不仅具有文物价值、档案价值，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二）西夏石刻档案反映了西夏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平

西夏的石刻档案还反映出西夏有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平。譬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一面为汉文，汉文篆额“圆润流畅，碑铭楷书淳厚古朴，外柔内刚”<sup>[19]</sup>，正文的汉文为楷书，“用笔以方为主，清秀劲健，规矩森严”<sup>[20]</sup>。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另一面为西夏文，西夏文额头篆字“笔画婉转扭曲，有流动感，连接成圆角的方块字，字型同西夏帝陵寿陵出土残碑西夏文小篆”<sup>[21]</sup>，这种字体不仅“‘肃穆端庄，秀茂纯古’，而且‘行笔自然浑成不露痕迹’，‘回环照应，错落有致’，可视为西夏书法之珍品”<sup>[22]</sup>。正文为西夏文楷书，“字的形体方正，结构严整，布局合理，凿刻深浅得当，每个字都具有立体感”<sup>[23]</sup>。西夏陵七号仁宗仁孝陵的正文同样为楷书，“刀笔遒劲有力，行文整齐规范。这种线的艺术，不仅仅可以单字而论，更可谓是一种‘净化了的线条美’，其中的‘情感意志和气势力量’，简直让人叹为观止”<sup>[24]</sup>。西夏的这些石刻档案的文字，字体端庄，镌刻艺术高超，刀法遒劲有力，线条流畅，都是极其难得的书法艺术珍品。

西夏石刻档案的价值还在于为后人保留了部分很有名的书法家，为我们研究西夏书法艺术提供了原始资料。譬如，现藏甘肃武威市博物馆的编号G32·001“凉州重

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汉文篆额“圆润流畅，碑铭楷书淳厚古朴，外柔内刚，系张思政所书”，他在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乾顺时任供写南北章表，是西夏中期的一位书法家。西夏文篆额“简约严整，碑铭楷书端庄朴实，自然飘逸，系浑崑名遇所书，他是西夏切韵博士，官阁门冷批，是一位西夏文书法家”<sup>[25]</sup>。

（三）西夏石刻档案可以补充西夏传世文献的缺略

西夏石刻档案补充了许多西夏传世文献未记载的新内容。

第一，增添了西夏新的封王名号。从有关西夏史籍的记载可知，西夏有封王之制，但梁国正献王的封号并未见史籍记载。1975年在西夏陵区一〇八号陪葬墓即梁国正献王墓的出土补充了新的西夏封王称号，“从夏、汉两种文碑缀合译释，知墓主人为‘尚父、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六部[监六]、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sup>[26]</sup>。

第二，补充了党项夏州政权时期和西夏建国后的一些新的职官设置。譬如，陕西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藏的编号S32·004“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并盖”中，“称当时的夏州节度使李彝兴为‘府主大王’，证实《宋史·夏国传》所言‘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之说是可信的。序中还称夏州政权为‘上府’，称中原地区政权为‘南国’，这显然是站在夏州政权的立场上说的。元昊称帝后，在给辽、金的公文中一直将宋朝称为‘南朝’，从这里似乎可以找到端倪。序中提到，太原康公跟随在府主大人左右，由于战功显赫，历任定塞都副兵马、安远将军使、东城都虞候、随使左都押衙、随都知兵马使，直到五州管内都军指挥使”<sup>[27]</sup>。这些原始档案的确是研究西夏前身夏州政权封王和职官设置的重要史料。

西夏造像题记档案中的“‘沙州监军

司’、‘仪鸾司’等官制名称在迄今所见的西夏官制材料中均未记载”，这是西夏设置新机构的档案资料。还出现了：“‘都大勾当’这一职官名称，中原史籍中只有‘都大’和‘勾当’之职，这说明西夏在创制官职名称时，不仅吸收了宋朝职官名称，而且有所发展，将‘都大’和‘勾当’合二为一。‘小班’这一职官，应是仪鸾司内较低微的职称，其职能可能专门负责皇家的宫殿、寺庙的修建。这样低微的职官在目前有关西夏职官名称的史籍中，还未涉及，这成为我们研究西夏低级职官的一个新材料”<sup>[28]</sup>。以上这些造像题记档案为我们研究西夏官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

第三，补充了西夏国名的不同称谓。譬如，西夏史籍和出土文物记录的西夏国名有很多称谓，如“大夏”、“西夏”、“白上国”、“白上大夏国”、“番国”、“邦泥定国”、“合申”、“河西”、“唐兀”、“唐古特”等等。“西夏众多的国名与称号，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以及各从不同角度对党项族或西夏的称号。”通过人们对西夏史的逐渐深入研究，对这些名称已越来越熟悉。但造像题记档案中出现的一些国名称谓却十分的陌生，这又填补了西夏国名称谓的缺略。譬如，造像题记中榆林15窟前室甬道北壁东侧西夏文题记记载“南方阁普梅那国番天子国五大臣官律菩萨二……当为修福……”中的“阁普梅那国”却是人们陌生的。“南方阁普”应是“南方瞻部”。“梅那国”的来历，据专家研究认为，它可能来源于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人的民族称谓，因为，据汉文史籍《新唐书·党项传》和《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称为“弭药”。西夏文辞书《音同》、《文海》和西夏宫廷颂诗等记载，党项人自称“没你”。“弭药”、“没你”和“梅那”的读音相近，可能是同一个名称的不同音译。<sup>[29]</sup>

第四，增添了新的农村组织机构。譬如，造像题记档案中的“莫高363窟南壁两身供养人的榜题中，姓名之前都冠以‘社户’之称。‘社’在我国古代农村是一种常设的组织，一般由本村或邻村几十户人家组成社，以‘教督农桑，实行互助，教育怠惰之人’。这就充分说明西夏时期也有‘社’的建置”<sup>[30]</sup>。

第五，增添了新的地名、寺名和军名。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地出土的西夏造像题记档案中记载了一些史籍未载的新的地名、寺名和军名。如“大壕寨”、“奉天寺”，榆林25窟中的“前长军”，榆林29窟中的“御宿军”等。这一切都将成为研究西夏地理、宗教、军制等的重要资料<sup>[31]</sup>。

第六，补充了史籍失记的皇帝城号称谓。从相关的史籍可知，西夏皇帝有庙号、谥号、陵号、尊号，但未记载有城号的问题。而从西夏石刻档案可知，西夏皇帝还有城号。譬如，西夏陵墓出土西夏文残碑M108: 2 + 19有“风角”二字，据李范文先生考证认为“‘风角城皇帝’不是别人，而是西夏开国皇帝景宗元昊”。西夏陵墓出土西夏文残碑M108: 2 + 19和汉文残碑M108H: 71 + 74 + 95中都记有“明城皇帝”，西夏文残碑M108: 40 + 85中记载有“白城帝”。据李范文先生考证认为二者皆指“崇宗乾顺”<sup>[32]</sup>。这些石刻档案中记载的皇帝城号可以补充史籍失记的内容。

（四）西夏石刻档案可以纠正西夏传世文献及其当代西夏研究中的谬误

西夏石刻档案最为真实地记录了西夏的历史原貌，是最为有力和鲜活的证据，它的出土能够纠正西夏传世文献以及西夏学者研究过程中的一些谬误。

第一，西夏石刻档案可以纠正西夏传世文献中人名记载的错误。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后人编撰的《宋史》、

《辽史》、《金史》、《西夏书事》、《西夏纪事本末》等史籍，都将西夏秉常和乾顺之朝的国相“梁乞逋”写为“梁乙逋”，这是错误的。根据西夏陵出土的“M108: 6 + 13”图版有“……后之舅梁乞逋等豪恶行以器[难盛]”知，西夏传世文献中的“梁乙逋”应为“梁乞逋”，梁乞逋为梁乙埋之子<sup>[33]</sup>。

第二，纠正了西夏王族拓跋部的族属和世系排列的错误问题。关于族属问题，编号S32·001“唐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墓志铭”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自唐代以来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元和姓纂》《辽史》《金史》认为出自鲜卑，《隋书》《旧唐书》《宋史》认为出自羌族。持鲜卑说的依据是唐林宝的《元和姓纂》，该书记录西夏王室先祖拓跋守寂是鲜卑族。持羌族说的则认为鲜卑拓跋部在历史上较为著名，因而将党项拓跋氏误认为是鲜卑拓跋部之后。但这仅仅是怀疑和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立石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拓跋守寂墓志铭，明确记载拓跋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显然元和年间（806—820年）成书的《元和姓纂》把拓跋守寂定为鲜卑之后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给后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以致后来的夏州拓跋氏家族墓志铭，均认为党项拓跋氏出自鲜卑。”<sup>[34]</sup>

此外，“唐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墓志铭”还纠正了党项世系排列的错误。经过众多西夏学者考证研究，认为“守寂之父为思泰，而《西夏文物》一书，误把思泰、思头当作一人，思头在《旧唐书·西戎传》明确其为‘赤辞从子思头……’从子即侄子，他应为守寂的曾祖辈，而非父辈。《拓志》的出土纠正了一些书籍之谬，并为增续唐代党项拓跋氏家族谱系提供了一条新的历史依据”<sup>[35]</sup>。

今人编纂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有拓跋守寂条“唐时党项部首领。拓跋赤辞孙。开元时封右监门都督、西平公。安史之乱，有战功，擢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后赠灵州都督。”<sup>[36]</sup>这一辞典所录条目有三条错误：一是拓跋守寂是“拓跋赤辞孙”。从拓跋守寂墓志铭看，守寂是拓跋赤辞孙子的孙子。二是说拓跋守寂“安史之乱，有战功”，该碑铭则记拓跋守寂“以开元廿四年十二月廿一日寝疾薨于银州”，拓跋守寂死于唐开元廿四年（736年），而“安史之乱”则发生于唐天宝十四载（755年），这时的拓跋守寂不可能参与平定“安史之乱”。三是说拓跋守寂“擢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关于拓跋守寂是否从事过这一官职，拓跋守寂墓志铭中并未提及，存疑<sup>[37]</sup>。

内蒙古乌审旗文管所收藏编号M42·001“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湊氏墓志铭”中记载湊氏与虢王李仁福育有五子，依次是彝殷、彝谨、彝氲、彝超、彝温。彝殷（又名彝兴）、彝超二人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和《宋史》中都有记载：宋长兴四年（993年），“仁福卒，子彝超嗣……彝兴，彝超之弟也，本名彝殷，避宋宣祖讳，改‘殷’为‘兴’。初为行军司马，清泰二年（935年），彝超卒，遂加定难军节度使”<sup>[38]</sup>。根据杜建录先生的研究，认为“可能彝超袭位在前，彝殷袭位在后，故《宋史》误记为‘彝兴，彝超之弟也’。湊氏墓志铭可纠其谬”<sup>[39]</sup>。西夏石刻档案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掌握了西夏的世系辈次排列。

第三，纠正了西夏改元的时间问题。西夏石刻档案的整理与研究，能纠正有关史籍记载的纪年之错误。譬如，造像题记中“榆林窟之25窟有‘雍宁甲午初’、莫高窟之285窟中有‘雍宁乙未二年’，再证之以上海博物馆款刻‘雍宁丁酉四年’官印，可确知西夏改元雍宁在甲午。按张鉴《西

夏纪事本末》年表所记，夏改元雍宁在乙未，当宋政和五年。戴锡章的《西夏纪》沿用此说。吴广成《西夏书事》记‘雍宁元年’为宋政和四年，岁在甲午。乙未为二年，当宋政和五年，与题记合”<sup>[40]</sup>。因此造像题记可订正《西夏纪事本末》和《西夏纪》等史籍纪年之误。再譬如，《宋史·夏国传》记载，宋乾道四年，“夏改元乾祐”<sup>[41]</sup>。在西夏陵仁宗仁孝陵出土的编号为 M2X: 189 + 199 + 393 的残碑上有西夏文译为汉文是“甲午五年内”，李范文先生考证为“甲午五年即仁孝之乾祐五年（1174 年）。由此得知仁孝改元乾祐当在庚寅，即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 年）。但《宋史·夏国传》云：乾道‘四年（1168 年）夏改元乾祐。’与残碑相差两年。《西夏纪事本末》卷一《年表》则云：‘乾道己丑（1169 年）’‘夏改元乾祐’。并附：‘或在戊子’（1168 年）‘或在辛卯’（1171 年）。三种说法全错”<sup>[42]</sup>。故石刻档案可订正《宋史》、《西夏纪事本末》等史籍记载夏改元乾祐的时间是错误的。

#### （五）西夏石刻档案提供了一些传世文献中缺载的婚姻情况

西夏传世文献均记载西夏的姑表婚是单向的，譬如，开国皇帝元昊娶舅女卫慕氏为妻，第二代皇帝谅祚娶舅女没藏氏为妻，第三代皇帝秉常娶舅女梁氏为妻。但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编号为 M42·002 “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的西夏石刻档案中记载有拓跋彝谨的岳母为拓跋氏，这显然是舅舅的儿子娶了姑姑的女儿为妻。由此可以证明，西夏的姑表婚并不是史籍所记载的为单向，而是双向的。从而印证了西夏文有关“为婚”与“舅甥”、“婆母”与“姑母”的含义<sup>[43]</sup>。

#### （六）西夏石刻档案提供了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材料

从目前发掘出土的情况来看西夏的石刻

档案数量并不少，通过查检这些石刻档案，发现用西夏文、汉文、夏汉文合璧和藏汉文合璧等多种文字刻写。譬如，出土于西夏王陵二号陵的西碑亭为西夏文刻写，八号陵的东碑亭有两座西夏文碑<sup>[44]</sup>；西夏王陵二号陵的东碑亭用汉文刻写<sup>[45]</sup>；夏汉文合璧碑主要有西夏王陵一〇一号墓出土的两座碑亭，每个碑亭有一座碑，且碑阳用西夏文，碑阴用汉文刻写<sup>[46]</sup>；编号 G32·001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是典型的夏汉文合璧碑，一面的汉文碑文和另一面的西夏文碑文虽说段落层次等方面不尽相同，但所记内容基本一致。因此，这是一部夏、汉文字相互对照的珍贵的字典，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价值类似。编号 G42·001 “黑河建桥敕碑”，同样也是研究西夏文与藏文字的活的字典。此外，还有元至正八年（1348 年）立石的敦煌莫高窟六体真言碑，敦煌莫高窟藏，用梵文、藏文、汉文、西夏文、蒙古文、回鹘文六种文字刻写<sup>[47]</sup>。这些石刻档案资料都可成为研究西夏文字的宝贵的实物资料，更成为开启西夏文字研究的新途径。同时，这些石刻档案还可成为研究党项与其他周边民族关系的有力佐证。

#### （七）西夏石刻档案提供了西夏文使用的最晚时间和西夏遗民活动的情况

西夏文创制之后，元昊将其定为国字并在西夏境内广泛推行，但西夏文的使用到底何时终止，史籍缺载。河北保定市莲池公园藏明弘治十五年（1502 年）编号 HB12·002 “保定西夏文石经幢”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答案。“明初西夏文刻经和明朝中期的西夏文石幢的发现，使过去认为西夏文字使用的时间下限下延了一百五十余年。西夏文字的使用，从公元 1036 年创制起至明西夏文石幢刻制时已有四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了。”<sup>[48]</sup>由这一则西夏文经幢的发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夏文字创制之



后,不仅西夏国普遍使用,即使到了明朝中期也仍然有党项后裔在使用西夏文字。同样,从这一石幢的立幢人有平尚、昔毕、依罗、嵬名等很多党项族姓可知,明朝中期也有大量党项后裔在中原地区进行各种活动。

此外,甘肃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编号G52·001“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也证实了西夏灭亡后其后裔活动的情况。“关于党项人在西夏灭亡以后的下落,我们曾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一文中作过一些探索,说明了西夏亡后部分党项上层人物参与了蒙元的各级统治机构,以及元、明之际来到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族人民发生同化的情形。”<sup>[49]</sup>上述石刻档案为我们提供了西夏文使用的最晚时间和西夏灭亡后西夏遗民在元、明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活动情况。

(八) 西夏石刻档案增添了西夏时期地理状况的新资料

西夏石刻档案的出土为西夏学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研究西夏地理状况的新资料。譬如“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多载志主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如后周广顺三年(952年),李彝谨‘归葬于夏府朔方县仪凤乡凤正里乌水原’;后汉乾祐三年(950年),李彝谨妻里氏‘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乌水之原’;后晋天福七年(942年),李仁福妻湊氏‘付葬于乌水河之北隅,端正树之东侧’;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继筠葬于‘端正北原之上,付于先茔’。奉政里又作凤正里,这里有一条乌水,茔地所在的乌水原台地,当为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无定河镇(原纳林河乡)附近的十里梁上,乌水即今天的纳林河,因为上述墓碑就在这里出土,

这对研究西夏时期的夏州地理,增添了新的网点和坐标。”<sup>[50]</sup>

(九) 西夏石刻档案反映了西夏的一些文书制度

西夏石刻档案还反映了西夏的一些文书制度,譬如平阙制度。西夏也和中原王朝一样,在撰拟文书时仍然特别注重和讲究一些礼节,即在撰拟文书时如遇到“天神、地祇、官阙、行李、皇太子”<sup>[51]</sup>等尊敬字词时都要用平阙制度,以此来表示尊敬之意。不仅如此,而且凡是遇有“官家”之“官”、“祖帝”、“帝”、“御前”、“制”、“御旨”等字样时,照样“其前皆空一格”<sup>[52]</sup>。这一制度在西夏各种石刻档案中普遍存在。譬如,西夏王陵残石“M2X: 5(图版叁)睦更安天祖院尊变年。‘祖’前空格,表示尊敬,疑追其先世”<sup>[53]</sup>。西夏造像题记中也出现了空格以示尊敬的情形,譬如,榆林窟汉文发愿文,15窟门顶右边、16窟窟口北壁各有一处长篇的题记,“(12)所将上来圣境,原是皇帝圣德圣感。伏愿(13)皇帝万岁,太后千秋,宰官常居禄位,万民乐业海长清”;又如,“莫高窟97窟北壁上层第一身罗汉的榜题:(1)西瞿海泥洲第一尊者宾度罗(2)跋罗堕阁大阿罗汉与自眷属(3)一千阿罗汉等敬奉佛敕,不入(4)涅槃,作大利益。颂曰”等,即在“皇帝”、“佛”、“颂”词之前空抬一字,以示尊敬<sup>[54]</sup>。

通过对西夏石刻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我们更加清楚地得知,西夏石刻档案是西夏最为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其种类多样,内容繁杂,对于研究西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也是中国古代档案的有机部分。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2.

- [2] 陈育宁,等.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册)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19-168.
- [3] 赵超. 中国古代石刻概论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7: 52.
- [4] 陈育宁,等.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册)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170.
- [5] 陈育宁,等.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册)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185-188.
- [6] 陈育宁,等.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册)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85-184.
- [7] 胡汝砺,编,管律,重修. 嘉靖宁夏新志 [M]. 陈明猷,校勘.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 153-154. 注: 这两篇碑文在《弘治宁夏新志》有著录,但并未录原文。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朱旂《宁夏志笺证》卷下著录了这两篇碑文的原文.
- [8] 徐立刚. 中国古代石刻档案的源流与特点 [J]. 档案与建设,2000(12).
- [9] 赵彦龙. 西夏文书档案研究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275.
- [10] 杜建录. 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综述 [M] //西夏学.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116.
- [11] 徐自强,吴梦麟. 古代石刻通论 [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03: 22.
- [12] 赵超. 中国古代石刻概论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7: 4.
- [13] 陈育宁,等.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册)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173-175.
- [14] 陈育宁,等.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9册)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15-280.
- [15] 陈育宁,等.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册)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101-136.
- [16] 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 西夏美术史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1: 104.
- [17] 陈育宁,汤晓芳. 西夏艺术史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0: 336.
- [18] 陈育宁,汤晓芳. 西夏艺术史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0: 337.
- [19]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191.
- [20] 陈育宁,汤晓芳. 西夏艺术史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0: 336.
- [21] 陈育宁,汤晓芳. 西夏艺术史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0: 336.
- [22] 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 西夏美术史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1: 105.
- [23] 陈育宁,汤晓芳. 西夏艺术史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0: 336.
- [24] 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 西夏美术史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1: 105.
- [25]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191.
- [26] 李范文. 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4: 10.
- [27] 胡玉冰. 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 [J]. 人文杂志,2004(3).
- [28] 赵彦龙. 西夏文书档案研究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281-282.
- [29] 赵彦龙. 西夏文书档案研究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281-282.
- [30] 赵彦龙. 西夏文书档案研究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282.
- [31] 赵彦龙. 西夏文书档案研究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283-28.
- [32] 李范文. 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4: 12-14.
- [33] 李范文. 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4: 16-17; 史金波. 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 [J]. 民族研究,1992(1).

- [34] 杜建录. 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综述 [M] //西夏学.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119.
- [35] 王富春. 唐党项族首领拓拔守寂墓志考释 [J]. 考古与文物, 2004 (3).
- [36]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历史大辞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1767.
- [37] 王富春. 唐党项族首领拓拔守寂墓志考释 [J]. 考古与文物, 2004 (3).
- [38] 脱脱, 等. 宋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3982.
- [39] 杜建录. 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综述 [M] //西夏学.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119 - 120.
- [40] 赵彦龙. 西夏文书档案研究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281.
- [41] 脱脱, 等. 宋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4026.
- [42] 李范文. 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33 - 34.
- [43] 史金波. 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 [J]. 民族研究, 1992 (1).
- [44] 李范文. 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3 - 5.
- [45] 李范文. 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3.
- [46] 李范文. 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8.
- [47] 杜建录. 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综述 [M] //西夏学.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115.
- [48] 史金波, 白滨. 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 [J]. 考古学报, 1977 (1).
- [49] 白滨, 史金波.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 [J]. 民族研究, 1979 (1).
- [50] 杜建录. 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综述 [M] //西夏学.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120.
- [51] 谢深甫. 庆元条法事类 (卷十六) [M] //杨一凡, 田涛, 主编. 戴建国, 点校.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347.
- [52]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M]. 史金波, 聂鸿音, 白滨, 译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35 - 37.
- [53] 李范文. 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40.
- [54] 赵彦龙. 西夏文书档案研究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279.

## A Discussion of Tangut' s Archives on Stone

Zhao Yanlong & Qiao Juan

**Abstract:** The Tangut' s archives on stone are almost destroyed by the Mongolian army; however, based on the unearthed Tangut references and relative historical records, types of Tangut' s archives are complete as the Central Plain' s. The Tangut' s archives on stone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saving all the records in every part of the Tangut society' s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the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se archives on stone and relative historical records. Then 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type and value of these archives on stone and finally works out a complete and correct recognition of Tangut' s archives on stone.

**Key words:** Tangut, the archives on stone

(责任编辑 魏淑霞)